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术著作

广义经济结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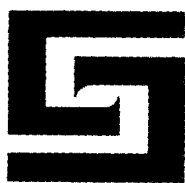
Economic structure in the broad sense

陆剑杰/著

- 历史哲学视域中的经济结构
- 经济科学视域中的经济结构
- 中国国情视域中的经济结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术著作

广义经济结构论

Economic structure in the broad sense

陆剑杰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义经济结构论/陆剑杰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7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术著作)

ISBN 7-80190-572-5

I. 广… II. 陆… III. 经济结构-研究
IV. F0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5345 号

导 言 一^{*}

花费我许多精力，用了三年多时间写成的这部《广义经济结构论》，终于能交付评审，我有如释重负之感。但事情并未完结，在听取了专门家的意见之后，我将认真加以补充修改并努力使之早日问世。此时此刻，我想得最多的是中国哲学和经济学的交流合作的问题。为此，我写下了以下的文字。这些文字对于阅读我的这部著作也许有某种引导的作用。所以，虽是在写完全书之后所作，我仍称之为“导言”。

我想先说一下此书写作的缘由和过程。1998年春，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进行年度评审。在所发“指南”中有一个题目引起我的兴趣。这个题目就是“当代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问题研究”。我之所以感觉兴趣有两个理由：第一，这是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性的题目。建国50多年，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展现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

* 这篇“导言”写于2002年10月本书交付评审之前。2003年9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来《关于清陆剑杰同志对〈当代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问题研究〉进行修改的函》，对书稿作了肯定的评价，同时转告同行专家通讯鉴定时提出的修改意见。我按照这些意见并继续学习初稿完成后中央的有关文件和经济学界发表的研究成果，对书稿作了许多补充和修改。2004年9月28日完成新稿之后，因有一些新的体会需要向读者交代，又写了一篇“导言”。这样，本导言就称为“导言一”，新写的则是“导言二”。

系矛盾演进的生动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获得长足的发展，这证明曾经严重地存在着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矛盾，经过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然而，在取得成就的同时，新的矛盾又出现了，有的甚至导致许多消极社会现象的产生，成为学术研究和政治实践中的难题。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问题”，对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对于我国现代化大业的进一步展开和如期完成，都具有重大的以至根本性的意义。第二，这又是一个具有理论创新价值的题目。创新是人类实践总过程的基本特征，当然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的基本特征。理论创新不可能凭空而就，它是在研究和回答新的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出现的。研究“当代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问题”，如果能够揭示中国半个多世纪实践的内在实质，那就一定会出现创新性的成果。基于这两个互相关联的理由，我申报了这个课题并幸运地获得通过。

拿到这个题目以后，我意识到，必须把调查研究和资料汇集的工作做好，方有牢固的实践基础和资料条件。当时，我已经有一个认识：中国是一个生产力、生产关系结构具有二元性或中介性的国家，分析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离不开这个基本的国情，而最能表现这种二元性的，是目前各个大城市和它所辖郊县的城乡对比。于是，我选择青岛、西安、重庆、武汉、南京 5 个城市，分别作了访问、考察，获得了许多教益。与此同时，我乘建国 50 周年大量经济学著作和史料、统计资料出版之际，广泛收集，作为基本资料予以研究；我对国家图书馆涉及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经济结构的图书资料作了阅读，对其中国外学者的论释以及 2000、2001 两年的新书尤加注意，希望能了解最新的见解；我还对 1999 ~ 2002 年近四年的《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瞭望新闻周刊》作了逐日逐期的跟踪研读，摘取了我觉得有用的大量现实材料，分类汇编成册，这是可供我思想驰骋的知识原野。

在调查研究和资料汇集中，我又意识到，要做好这项国家课题，必须对经济学有深刻的了解，而我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恰恰缺乏经济学修养。这个困难几乎使我却步。但既已受领任务，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做。于是，我成了一个经济学的学习者。我温习了马克思的主要经济学著作，对曾经读过两遍的《资本论》，又重读了一遍。我读了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所著《经济学》的第16版，斯蒂格利茨所撰《经济学》的上下册，以及大量的国外和国内学者所作的经济学、经济学说史、经济结构理论的作品。恩格斯说过，他学自然科学是一次“脱毛”，但正是这一次“脱毛”，使他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我是凡人，对经济学算是经历了一次“半脱毛”，所得的体会是很肤浅、很有限的。

在做了这些工作以后，我进入写作过程。鉴于如下的原因，我把以“当代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问题”为主题的著作写成了《广义经济结构论》。第一，2000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2001年3月中国九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朱镕基总理所作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均提出了“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指导方针，突出了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践任务。中国的现实状况证明：经济结构不合理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表现，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势在必行。第二，中国改革实践所提出的经济结构问题，

直接地说来是经济学问题，进一步探寻则又是哲学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中提出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概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概念；而这一哲学概念同现代经济科学的“经济结构”在所指上是同一的，在内容上则有着抽象和具体的关联。对二者做了这样有差异的同一理解的经济结构，正是我所说的“广义经济结构”。第三，我作为一个对经济学尚欠研究功力的哲学工作者，能借《广义经济结构论》的研究和写作，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学习和探讨现代经济科学的机会。这不仅让我在党校的教学中对经济问题取得一定的发言权，便于把理论和实践更密切地结合起来，而且会对我一向主张的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哲学和经济学联盟有一次亲身实践的体会。如需要对此尽力，我就能更加认真地去尽力。读者可以看到：这部《广义经济结构论》，实际上是一个哲学工作者学习经济学的笔记。说完了这部书的缘起与写作经过以后，我想围绕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谈下面几点。

第一点：关于建立和发展哲学和经济学的联盟

这个问题是按照中国学术理论界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在马克思那里，不存在什么“联盟”的问题，因为他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身二任的伟大学者。马克思青年时期致力于哲学、历史的学习、研究，从1836~1843年，他的笔记主要是哲学、历史方面的。如7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1839年）、8本《柏林笔记》（1840~1841年）、5本《波恩笔记》、5本政治历史学摘录的《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年）。马克思是在德国当时革命实践的推动之下，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有明白的自诉：“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与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学习。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

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①正是经济学的研究，帮助马克思从“自由自觉的劳动”的人本主义观念转变到以“生产劳动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的、具体历史的实践论，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崭新哲学，而创立这一哲学又只是为了揭示一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以《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宣告自己既是伟大的哲学家，又是伟大的经济学家。或者说，正因为他是伟大的哲学家，他才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正因为他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才是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在1845年、1846年写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同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没有来得及写出他一直想写的专门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就写在他的经济学著作中，写在《资本论》中，写在他的《经济学笔记》中。

但是，中国没有出现这样的哲学家兼经济学家的伟大学者。这也许是有历史原因的。在20世纪前半期，中国人民的主要实践是推翻当时的社会制度的革命和革命战争。在这一实践中，出现了毛泽东这样的既是哲学家、又是军事家、政治家的伟大人物。建国之后，特别是经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之后，他意识到自己不懂经济的局限性，用过认真的功夫来读经济学，但他始终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从同样的革命实践中涌现出来的邓小平，深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长于军事、政治，在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表现了他在哲学方法论创新方面的杰出才能，也显示了他作为政治家的难得智慧。他开辟了建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1页。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体制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1984年10月，在会见一次经济讨论会的中外代表时，邓小平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① 这些是谦逊的话，也是实在的话。所谓“从政治角度讲”，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系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坚持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基本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整体设计。作为“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作出了正确选择和战略决断，为我国经济学研究指明了方向。这是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但说他是经济学家，怕邓小平自己是不会接受的。中国解放以后的社会科学人才培养，过分强调学科分工，强调专业化，这也是较难出现集哲学家与经济学家于一身的物物的一个原因。我期望在今后的研究生培训中，能让一批在本科生、硕士生阶段学习哲学的人，在攻读博士学位和博士后的时候，转向经济学，也让一批学习经济学的人，在攻读更高学位的时候，转向哲学，经过若干年努力，培养出一批集哲学家与经济学家于一身的大学者。在目前的条件下，为了解决哲学和经济学研究的结合问题，我觉得应大力倡导建立哲学和经济学的联盟；即使在将来有了我所说的大学者之后，就哲学界、经济学界的关系而言，仍然有分工，仍然需要相互学习、共同攻关的联盟。在这样一个联盟中，哲学工作者和经济学工作者应当像俗话所说“分工不分家”。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77页。

国的哲学界，除了一些人选择“经济哲学”作为研究方向，对哲学经济学联盟作出更大贡献以外，更多的人应当关注和学习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经济工作中的人学问题、历史观问题、认识论问题、辩证法问题、逻辑学问题。我愿意作这样的一个哲学工作者，《广义经济结构论》算是我的一份真诚的努力、一点微薄的贡献、一丝弱而不竭的呼声。

第二点：关于经济结构问题的哲学分析和经济学分析的结合

中国当前突出的经济问题是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问题，而整个世界在信息技术引发的新科技革命的带动下，正在展开新一轮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对这一调整构成了逼迫性的挑战。由此也可以说：结构调整和升级也是世界性的突出的经济问题。如果这样的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我所说的哲学和经济学联盟在当前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共同研究当代世界和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中国的经济学界对于经济结构问题的研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就有讨论经济结构问题的专著问世，如1982年出版的张曙光所撰《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1984年出版的由孙尚清主编的《论经济结构对策》，都是当时引人注目的作品。也翻译了一些外国学者的论著如1988年译成中文出版的西蒙·库兹涅茨所撰《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在中国就颇有影响。到了20世纪末，中国改革指向深层次结构问题时，这类著作更大批问世。据笔者所读，大体分几类：第一类是从总体上研究经济结构的。如1992年出版的刘伟的著作《经济发展与结构转换》，1998年出版的潘恩强、马传景的著作《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1999年出版的陈文辉的著作《中国经济结构论》。第二类是研究经济结构中的次级结构的。农业结构方面，有2000年出版的林善浪、柳树青、张国的著作《中国农村经济

结构调整研究》；工业结构方面，有同年出版的周叔莲、郭克莎的著作《中国工业增长与结构变动研究》。第三类是研究经济结构中的局部结构的。如研究区域经济结构问题的著作。同时期的译作更大批问世，相应地评述西方经济结构理论的著作也日渐增多。至于报刊上关于经济结构的论文更是成百上千地问世。论文中关于“新制度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多有综述、比较、相互争论的作品。所有这些著述，都摆在中国哲学界学人的面前。但我想，恐怕很少有哲学工作者去关注并认真阅读这些著述，更看不到有哲学家去评论这些著述。我一直认为：在中国哲学和经济学的联盟中，哲学家应该更谦虚些，也更主动些。但真正这样去做的，知有多少啊！反过来说，我国经济学界是否也关注哲学，关注当代世界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发展，关注哲学的学习、研究，自觉地运用科学的哲学思维方式和方法去深化经济学学理，去回答和解决当代的经济学问题，那也不是十分乐观的。就经济结构问题来说，经济学家研究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及与之相关的就业结构）、产权结构（及与之相关的分配结构）、市场结构，很少显示他们的哲学素养和思辨能力。有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所分析的“社会经济结构”，认为唯物史观的“社会经济结构论”同现代经济科学的“经济结构论”是紧密相关的。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他们所研究的“经济结构”同马克思所分析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两码事。有一位青年学者在博士论文中对“经济结构”作了新的界定，说：“经济结构，一般是指社会经济活动各部分之间、社会经济运行在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以及由这种内在联系所表现出来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在评论这一定义时，论者指出：“这种对经济结构的认识显然受了皮亚杰结构主义理论的启发和影响”，这样的经济结构的概念意在“用整体观点来把

握社会生产力结构和生产关系结构”，它“与我们今天研究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地区生产力布局即生产力的空间结构等经济结构概念是明显地不同的。”^①论者所说，看到了经济科学所说的“经济结构”同哲学所说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区别，但是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并且，把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结构”理论同皮亚杰结构主义混同起来，也欠妥当。我引此段是想证明：我国许多经济学工作者对哲学是相当生疏的，就像许多哲学工作者对经济学也相当生疏一样。

我作为一名哲学工作者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体会到：经济结构的分析应具历史意味。一个历史地产生的经济结构，自有它产生的历史条件，也曾起到它的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经济结构会逐渐失去合理性，从局部的不合理需要调整，到根本上不合理需要扬弃。凡是历史上产生的东西必定会在历史上消亡，除了永恒运动的物质以外，世上没有一事物是永存的。经济结构的分析应具辩证意味。西方经济学家不赞同唯物主义辩证法，但他们在经历无数次的教训之后，不能不承认辩证的事实。从亚当·斯密的“市场万能论”到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普遍接受“市场失灵”概念的事实，表明辩证法的不可抗拒性。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论”到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普遍接受“政府失灵”概念的事实，同样如此。“私有产权”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产权事实，但“私有产权”不是绝对地好、无例外可用的。如果这样，为什么“私人资本”被组合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中有劳动者投资的介入，劳动者投资泛化之后出现了“没有私人资本控股

① 潘恩强、马传景：《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第11～12页。

的企业”？为什么公共品的生产仍需要由公有产权与之适应？同样，“公有产权”也不可能绝对地好、无例外地用。如果这样，为什么中国正普遍地建立“私有产权”，正利用股份制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新的产权形式？经济结构的分析应具人学意味。在目前的经济结构论中，人与生产资料一样被当作是生产力系统中的物质要素的力量。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好像是说出了马克思的一项伟大真理，而马克思本人却是批判地对待这一命题的，他说：把人当作是“创造财富的力量”，这是对人的“贬低”。“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把这种力量同其他的生产力——牲畜、机器——进行比较”，如果合算，他们宁可用牲畜或机器的力量来代替人的力量。^①在马克思看来，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人真正成为目的，人类社会才算进入美好的境界。人又是能动的主体力量，这种主体力量来源于人的实践本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和它们的发展、调整、建构、改革、革命，归根到底是人的选择、人的创造。这种创造活动是从既成条件出发的，又是经受实践的检验的，因此它的总过程必定是既合目的、又合规律的。只有坚持这样的人学立场和人学思想，我们才能对经济结构问题取得科学的认识，作出正确的决策。

第三点：《广义经济结构论》中所作的是把哲学分析和经济学分析结合起来的初步努力

我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见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的“经济结构”理论，同当代经济科学中的“经济结构”理论在所指上是同一的，研究的视角是各异的。马克思从哲学的视角看经济结构，以实践论为基础，从人的生产实践中的两个必然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262～263页。

系——人与自然的必然关系和人与人的必然关系，引申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把它们的总和界定为社会的“经济结构”。当代经济科学则从经济学的视角考察经济结构，以经济增长为准则，把从经济活动方式中引申出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产权结构、市场结构以及相关的需求结构、就业结构、分配结构等结构的总体理解为“经济结构”。

这样两种考察视角以及考察的结果之间有没有对应性呢？显然是有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结构理论不能作简化的了解，而应作还原的、有机的了解。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作了与传统哲学教科书相异的新阐释。“异”在何处呢？主要“异”在对马克思所指谓的社会经济结构，传统教科书认为：它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双层关系的总体；而我按照马克思的文本提出：它是生产力、生产关系有中介的多层关系的总体。马克思原本就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看到了亦此亦彼、居间联系的中介——“生产方式”。他多次写出同样的理论观点：“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① 同样的观点，还见于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② 作为“中介”的“生产方式”是何物？它就是人们常说的“劳动方式”、“劳动组织”（工场手工业、工厂、企业、企业集团……）。马克思举例论证说：手推磨这样的生产工具派生出个体手工业这样的劳动方式或生产方式，进而也就派生出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这样的生产工具派生出工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42页。

广义经济结构论

这样的劳动方式或生产方式，进而也就派生出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我对马克思的“三分法”或“三段式”又作了如下的阐释：生产力区分为要素的生产力和结构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区分为技术的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的或经济的生产关系。技术的生产关系是劳动者使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时发生的关系，关系本身是分工和协作，关系的总体是劳动组织，而劳动组织必有劳动管理作为调控机制；这种技术的生产关系就功能而言就是结构的生产力。这样，既是结构的生产力、又是技术的生产关系的生产方式就成为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的居间联系的中介，而与生产方式并存的是交换方式，二者构成经济坐标系的横标和纵标。

当我们对马克思所论的“经济结构”作了这样的理解以后，我们就建立起了它与经济学的“经济结构”的对应关系：

序 号	哲学所指的“经济结构”	经济学所指的“经济结构”
对应关系之一	生产力(生产工具)	技术结构
对应关系之二	生产方式(物质的生产关系)	产业结构
对应关系之三	交换方式(交换关系)	市场结构
对应关系之四	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	产权结构

按照如上的对应理解，《广义经济结构论》作了这样的篇章安排：第一编是“历史哲学视域中的经济结构”，下设四章：分别地分析生产力，两种生产关系，生产结构在市场中的实现，并综合地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运动。第二编是“经济科学视域中的经济结构”，下设五章：同生产力分析对应的是技术结构分析，同生产方式分析对应的是产业结构分析，同经济关系分析对应的是产权结构分析（其中包括分配结构分析），同交换方式分析对应的市场结构分析，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分

析对应的是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的矛盾和经济结构内在矛盾的分析。第三编是“中国国情视域中的经济结构”，下设四章，分别分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实矛盾”、“中国经济结构的现实矛盾”、“正确处理中国经济结构矛盾的战略选择”。这样的篇章安排体现了作者的意向：从哲学分析到经济学分析，把哲学和经济学统一起来；从理论分析到国情分析，把理论和实际统一起来；从结构分析到矛盾分析，把现实描述和未来规范统一起来。既提出了作者对经济结构问题的系统理解，又回答了国家社会科学课题规划指南提出的主题：当代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它的历史、现状和今后走向。

第四点：《广义经济结构论》在哲学分析和经济学分析相互参照中所作的若干探索性理论思考

理论研究工作的努力方向是实现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艰难的工程，有赖于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在集体智慧充分积聚之后才会出现理论大师，予以集成，形成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新的学派。这是一条汇百川而入大海的江河；这是一座靠高原而举托入云的山峰。我作为一名普通的哲学工作者和经济学的学习者，充其量不过是江河中的一滴水、山峦间的一块石，是很难说得上理论创新的。但就个人的意愿和实际努力来说，确是不甘于人云亦云，也不止于诠释注解，希望对问题作创新性质的思考。

从1984年发表第一篇哲学论文以来，我一直是这样地力求进取的。这期间我写了三部专著：一部是1994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逻辑分析》，另一部是1997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9～21世纪中国的命运——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基本规律研究》，第三部是今年12月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实践问题和矛盾问题新论》。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实践唯物主义”理解，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

哲学界的同仁们都知道的。我的三本专著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总名也许可以称《实践唯物主义通论》。其第一部是“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分析”，第二部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运用”，第三部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干部读物”。将来如有可能，我想修改我的这三部书，并以《实践唯物主义通论》为书名重新加以出版。在这三部书内记载着我的力求创新的研究心得。在第一部书中，我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学”的三段式阐释体系，认为三者均以实践论为核心，以实践中的主体客体关系为主题，以实践地认识并改造世界、实践地认识和改造人自身为宗旨，由抽象到具体地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辉煌逻辑。我指出：在马克思那里，世界观是抽象的认识论，认识论是具体的世界观；认识论是抽象的历史观，历史观是具体的认识论；而就最具体形态而言，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在第二部书中，我运用我所理解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了自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到21世纪中叶以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200多年间，贯穿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统一过程中的若干基本规律。包括：中国社会的发展由相对平衡经严重不平衡向新的相对平衡复归的规律，中国社会运动由封建社会解体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的中介过渡的规律，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多种可能性、两条基本的发展道路而社会主义道路占优的规律，中国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规律。这样地提出和回答问题，在国内尚属首次。这项研究成果反过来确证：对马克思的哲学作“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并把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展开过程界定为从世界观经认识论到达历史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在第三部书中，我把上两本书的研究心得写成一部字数不到10万的“新实践论”、“新矛盾论”的文本，并就其中的历来争论不休的45个学理问题写了“诠释”。我想通过这部书使工作